

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

应 峻 王钰琛 金淑霏 赵宇翔

摘 要 医学图书馆是汇集医学信息资源、提供医学信息服务和传播医学知识的中心,可发挥专业优势,在面向健康中国战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健康智库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学界对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探索尚在起步阶段,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系统梳理。首先,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梳理总结图书馆与智库建设、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现状,并从推动面向健康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赋能医学科技创新与医学科普行动、促进医学图书馆数字化转型与业务创新三个角度阐释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价值前景;其次通过深度访谈,从行动路径和发展过程两个维度分析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流模式,包括“战略驱动+品牌转型”“机构重组+精准循证”“协同创新+业务拓展”三种,纵向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在智库活动起点发挥信息资源保障作用,在智库活动前端发挥情报支撑作用,参与智库建设全过程中的核心活动。再次,从动机障碍、机会约束、能力瓶颈三个层面剖析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实践中的挑战。最后,对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议。图2。表5。参考文献49。

关键词 医学图书馆 健康中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健康信息学

分类号 G258.6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YING Jun, WANG Yuchen, JIN Shufei & ZHAO Yuxiang

ABSTRACT

Medical libraries, designed as centers of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edical knowledge service, and medic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show distinctive advantages in playing crucial roles in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nd constructing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The investigations on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have still been in the initial stag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need to be systematized. This paper adopted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case illustr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fully explore the value prospects and practice mode of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constructing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libraries and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nd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illustration. Then it explained the value prospects of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constructing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romoting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for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empowering medical technical innovations as well as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nspi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通信作者:赵宇翔,Email:yxzhao@vip.163.com,ORCID:0000-0001-9281-3030(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AO Yuxiang, Email:yxzhao@vip.163.com,ORCID:0000-0001-9281-3030)

service expansion in medical libraries.

Secondly,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e mode of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constructing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tion path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main action paths: strategy-driven service and brand transform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precise evidence-based consult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expansion. Meanwhile, all medical libraries in different paths follow a three-phase development process: starting as information resource curators at think tank initiations, then continuing as intelligence supporters in think tank preparatory work, and finally working as cor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Thir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 of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constructing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from three aspects: motivation barriers, opportunity constraints, and ability bottleneck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2 figs. 5 tabs. 49 refs.

KEY WORDS

Medical library. Healthy China. New types of Chinese think tank. Health informatics.

0 引言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备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和区域分布不均衡等诸多矛盾与挑战,决策环境日益复杂,决策难度大幅度增加。数字化、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对决策透明度和

正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和地方决策层都迫切需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出思想、出谋划、出建议,促进卫生与健康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促进卫生与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医学图书馆作为专业化图书馆,一方面承担着信息资源保障和信息服务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重要机构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健康中国战略。在当前生物医学不断推陈出新、数据科学蓬勃发展、图书馆数智化转型的趋势下,医学图书馆也在持续升级转型,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医学信息资源汇集和医学知识传播的重要机构,医学图书馆在提供专业信息资源和知识服务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有望在面向健康中国战略建设新型智库过程中发挥关键且能动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学者已成为智库研究的活跃力量^[1],但聚焦于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研究还较少。鉴于此,医学图书馆如何抓住机遇,积极助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一个亟待讨论的话题。本文在文献和案例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深度访谈,充分挖掘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价值前景与行动模式。

1 图书馆与智库建设

国外智库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与图书馆发生了密切联系。首先,智库作为强调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从事研究活动时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支撑,对相关信息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大部分智库机构内都设有实体或数字图书馆^[2]。其次,部分图书馆发展到了一定形态,信息资源积累的量变为向智库转型的质变奠定了基础。例如,国际知名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就是由胡佛战争图书馆转型而来^[3]。胡佛战争图书馆在初创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分类保存与战争相关的资料,并开展战争相关的学术研究,后通过创新思想、开拓研究领域、健全管理体制等措施,成功转型并跻身国际一流智库行列。美国国会图书馆承担国家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的双重职能,其下设的国会研究服务部是美国国会的重要专属智库,旨在为国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支持、情报分析、保密咨询等立法决策服务^[4]。

在西方语境下,图书馆与智库作为实体机构的使命、性质、职责存在较大差异,学者研究关注的主题也交叉甚少。在关注智库服务于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职能时,图书馆发挥如下作用:一是图书馆行业内组成图书馆专业领域智库,探讨研究图书馆的发展与未来^[5];二是图书馆参与行业及公共文化领域的政策制定^[6];三是图书馆直接介入政策制定的过程,担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7]。近年来,国内图书馆界也关注到智库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2009年,有学者将智库视为图书馆发展的新机遇,提出重新定位现代图书馆的功能,构建图书馆智库^[8]。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与战略地位,迅速引发了图书馆学界探索的热潮,相关研究文献呈现井喷式增长并逐步深入。例如,黄如花等将新型智库建设视为图书情报机构服务转型的机遇,提出了图情机构参与智库建设的具

体路径^[9];初景利等通过分析图书馆与智库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10]。

基于已有文献,笔者归纳了我国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三种路径与呈现形式。一是图书馆围绕智库机构建设提供支撑、辅助性服务,包括信息资源建设与保障^[11,12]、嵌入智库活动过程的服务(知识咨询、情报技术支持、智库成果评价、智库成果复用)等^[9,13],这也是新型智库战略实施后,图书馆行业论证参与可行性、探讨理论可行路径时热度最高的切入点。二是图书馆建设智库的功能体系,直接提供智库型服务^[14,15],即面向具有决策需求的用户提供涉及过程支持和产品支持的智库知识服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高校图书馆对接高校管理层、科研管理部门、科研团队、政府、企业等主体,满足其智库型服务需求^[16,17]。《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也提出,大学图书馆要探索创新型智库服务^[18]。三是图书馆整体(全馆)或部分(新建机构、部门或工作组)转型成为智库。我国科技图书馆2006年起转向专业情报分析机构,自2015年进入科技智库转型发展阶段^[19],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湖北省科学图书馆)等均出现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情况。实际上国内图书馆并未舍本逐末地追求自身向政策咨询机构的完全转型,而是在保持和发展传统图书馆功能的基础上,探索“所馆一体化整合”或“功能拓展式”转型。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种参与路径并非互斥关系,而是体现出图书馆与智库不断融合发展的特征。以国家图书馆为例,国家图书馆自1992年起为全国人大立法与监督职能提供信息支持与保障,1998年起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两会”智库服务,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将“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列入国家图书馆的法定职能,2021年国家图书馆入选首批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2 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

2.1 研究现状

通过对国外医学图书馆典型业务的梳理,本文将国外医学图书馆在参与智库活动和发挥决策支持方面的作用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智库研究与制定医疗健康政策、解决医学问题,遵循“循证医学”原则,依赖于图书馆提供的庞大医学资源“证据库”^[20,21],其中较为知名的如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建设的PubMed、英国Wiley公司的Cochrane Library等数据库。以NLM为核心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络采取扩大馆藏范围、建立数据库等针对性举措,满足用户对卫生政策信息和公共健康信息的需求^[22],促进公共健康政策和公共卫生信息的可及性,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智库作为政策与公众间的桥梁作用。

第二,国际医学健康领域极为关注基础研究成果在改善人群健康中的转化应用,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成为热点话题。转化医学发挥着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转化的桥梁作用,消弭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研究以及临床研究转化为临床决策、预防医学、药物研发、公共健康政策和人群健康之间的壁垒。图书馆行业迅速在其中发现了自身的用武之地,支持转化研究的跟踪与评估、数据管理、研究者合作网络、团队科学管理、社区外展及教育培训等各个环节^[23]。例如,华盛顿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成立转化研究和信息实验室,为转化医学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电子数据采集(REDCap)、数据设备支持、虚拟现实设备支持、移动应用开发咨询等14项具体服务^[24]。

第三,临床医生及护理人员是临床医疗决策最主要的践行者,对医学文献和证据资源一直存在着总体多元化、个体精细化的需求。长期以来,健康科学图书馆通过设置临床医学图书馆员(clinical medical librarian)、嵌入式学科

馆员(embedded librarian)、信息专家(informationist)等专业馆员岗位,为临床决策者提供个性化信息与知识服务,帮助临床医护人员节省在获取、识别和处理海量医学文献上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提升临床决策质量、改善临床最终结果等方面彰显图书馆的效用与价值^[25,26]。近年来大数据研究推动了基因组学技术和精准医学的发展,进一步要求医学图书馆员深度嵌入临床环境,协助临床医护人员结合患者个体差异选取最佳医学证据,继而纳入精准治疗与个性化护理决策。

上述循证资源建设、转化医学、医学馆员嵌入式知识服务等主题也引起了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关注。大部分研究讨论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优势与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文献资源支撑、人才资源保障、专业服务供给等方面,也有研究提到了有力的政府支持^[27]。在执行路径上,相关研究将医学图书馆智库建设与智库服务联合讨论,一是将智库机构作为用户,通过为智库提供知识服务从而为智库建设提供保障;二是直接开发医学图书馆的智库功能,向决策支持需求者提供智库服务,服务对象包括所在机构的各级管理人员(决策层、科研管理部门、高校学科建设与规划部门、高校转化医学机构^[28]、地方医院管理层^[29])、科研队伍、临床医护人员、医药企业等。

实践研究方面,根据二者结合方式不同,国内对医学图书馆与智库关系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主题。一是医学图书馆向智库转型发展。曹玲静等通过分析归纳NLM等国际研究型图书馆的战略规划,认为国外的图书情报机构已经向知识服务机构、智库转变^[30]。田杰等认为医院图书馆应从信息库型图书馆转变为“信息库+思想库”中心,即“能够发挥智库功能的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31]。二是将智库理念引入图书馆信息保障与知识服务之中,涉及图书馆的资源、人员、平台、技术、服务等多个方面。董丽提出智库服务是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的重要内容^[32]。胡姗姗等提出医学院校图书馆可面向

智库提供专业化信息分析、个性化信息定制、特色化信息存储、多样化智库传播等服务^[33]。汪芳提出医学高校建立专项智库,可为医学高校的发展规划提供服务、为医学科研团队提供服务,并辅助培养医学高校智库型人才^[34]。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35]、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36]等提供的决策支持、学科建设、学科前沿分析等服务,也被认为是较为典型的智库服务实践。

2.2 价值前景

2.2.1 推动面向健康中国战略的新型智库建设

健康中国的治理实践离不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智慧支撑和技术支持。面向健康中国战略的新型智库(以下简称“新型健康智库”)建设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权威性重大研究成果少,有实力的高端智库较少,缺乏国际影响力,整体协调度不够^[37,38]。目前聚焦新型健康智库建设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较少,基础理论研究整体水平有待加强,医学图书馆应该把握医学学科特性,立足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借鉴图情学界研究成果,回答新型健康智库建设的基础性、理论性、方向性问题,积极承担保障者、推动者甚至是主导者的角色。

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多方参与、周期长且复杂的系统工程,由政府单一管理向全民共建、共治、共赢、共享转变。医疗服务机构、医药研究机构、健康服务及健康制造企业等关键行动主体既是政策作用者、利益相关者,又是知识提供者,知识与权力的双向互动性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新型健康智库应通过“下达”满足上述关键行动主体的多样信息需求^[39],另一方面应为其上传诉求至公共政策制定层面提供途径,以构建产学研医融合一体化的多主体健康治理生态。医学图书馆跨学科的思维、方法与用户服务经验,以及以学科交叉、循证、嵌入为核心的业务实践范式,能够调动多学科、多视野、多主体参与转“智”成“治”的健康协同治理过程,成为协助新型健康智库突破成果孤岛化、

碎片化、同质化的关键力量,以凝聚健康共识,引领健康治理。

2.2.2 赋能医学科技创新与医学科普行动

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三个面向”基础上,首次加入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一新要求,体现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围绕我国医学科技创新在能力与产出、体系与机构、投入与支持等关键方面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40],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在医学科技战略、规划、布局、政策上发挥引领作用,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前瞻性、长期性研究,这无一不需要科技情报的支撑。特别是新冠疫情使全球科技合作网络、竞争格局与产业供应链发生了深刻变革,医学核心技术与关键产业布局成为国际化竞争战略的重要方向。医学图书馆在追踪科技前沿、科学知识管理、技术创新转化、优化临床决策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能够高效赋能科技智库业务的开展。

2022年8月4日,科技部、中宣部、科协印发《“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再次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医学是谣言滋生的重灾区,医学科学普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医学领域,顶级智库着眼于重大战略问题,其他智库呈现散、弱、小状态,长期以来很少有智库把目光投向公众服务,忽略了应承担的引导主流舆论、凝聚科学共识、倡导理性思维的重要任务。医学图书馆的参与能够有效弥补当前智库在用户下沉上的欠缺,对政策辩论场上无序参与、非理性的声音及时纠偏,构建全民参与的集医学知识普及、科学观念普及、医学民主决策于一体的良好生态,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2.2.3 促进医学图书馆数智化转型与业务创新

参与新型智库建设是医学图书馆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是探索数智化转型路径、开拓深度知识服务场景的有效抓手。智库研究经过长期

发展,逐步向专业化、精细化、数字化、实证化方向演变,专题研究资源的建设与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智库发展的瓶颈^[41]。医学图书馆通过洞察并满足新型智库建设对医学领域数据和信息资源的精细化需求,改变智库专家研究与智库专题资源建设各行其是的局面,能够探寻自身业务创新的生长点,实现新型智库建设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双螺旋促进。

近年来,智慧医疗与数字健康催生了更多样的真实世界数据(Real World Data, RWD),包括医院电子病历数据、医保数据、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区域健康医疗数据、健康/安全监测数据、死亡登记数据、可穿戴设备数据及其他健康数据(如疫苗接种数据)^[42]等。智慧医院积极引入数字孪生、5G、AI等技术,为业务数据的深度沉淀与价值再造奠定了基础。这些数据资源在智库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长期来看也必将积累成为国家医学健康战略资源。传统业务模式下,医学图书馆通过提供科技文献资源、科技情报服务能够支持医学科技创新的快速跟踪策略,保证我国医学科技事业发展在国际上紧跟前沿不掉队;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对RWD的长期保存、治理、复用和价值再造,则能揭示我国人民健康的真实情况与需求,符合我国健康事业以人为本、关注人群的价值取向。医学图书馆通过开拓业务领域,介入对RWD的治理体系、组织标准、共享机制、复用开发的研究与实践,能够有效链接健康医学数据资源与新型智库,满足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需求。

3 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模式分析

3.1 访谈设计

医学图书馆是由医学院校、医院、医学研究机构、公共健康机构或医学协会建立并管理的图书馆^[43]。为全面梳理总结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模式,本研究对医学图

书馆馆长或综合图书馆分管医学业务的馆长进行深度访谈,以访谈语料作为主要数据源。

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首先,根据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选取有医学相关学科(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中医学、药理学等)上榜的高校;其次,选择医学重要科研院所和临床机构;同时利用数据库检索和网络搜索结果,结合参加医学图书馆各类学术会议、业务论坛、交流的机会,广泛了解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情况,调研得到有规划或已参与智库建设的医学图书馆名单。结合以上三方面内容形成备选医学图书馆名单,在综合考虑全面性和典型性的基础上,选取初始访谈对象开始访谈,同时也邀请初始访谈者推荐名单外访谈对象作为补充。

由于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行动存在差异,本研究设计了差异化的访谈提纲。访谈开始时,首先提出“您所在医学图书馆是否已经采取行动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这一问题,根据回答对受访者做简要分类。对所在医学图书馆已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馆长,重点围绕其开展契机、布局规划、已有行动、发展过程、实践困难等问题进行访谈;对于所在医学图书馆已有规划却尚未行动的馆长,重点提问未开展行动的原因和障碍。部分访谈提纲如表1所示。

访谈时间为2022年5—10月。每位馆长的访谈时间约60—120分钟。在访谈开始前向每位受访者详细介绍访谈目的和受访者权利,并在获取受访者知情同意后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对录音文件进行机器转译和人工清洗处理,用于后续编码分析。访谈数据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开放式编码,通过不断比较、讨论、协调、整合,直至访谈资料达到饱和。最终共访谈了25位医学(含中医和西医)图书馆馆长(编号A1—A25),其中10位来自高校图书馆,10位来自科研院所图书馆,5位来自医院图书馆,均具备20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验,且目前仍活跃在业务和管理一线。

表 1 访谈提纲(部分)

访谈对象	访谈问题示例
所在医学图书馆已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馆长	①贵馆在何时、何种契机下开始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 ②针对参与新型智库建设,设置了怎样的目标,进行了怎样的布局,采取了哪些行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③在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行动深入过程中,有哪些阶段性或里程碑事件?贵馆的实践行动有哪些迭代和升级? ④在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行动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所在医学图书馆尚未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馆长	①贵馆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参与新型智库建设? ②贵馆是否有针对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规划?

3.2 行动路径

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医学图书馆采取了差异化的行动模式。根据时间跨度和服务用户层次的不同,本研究归纳出三种典型的行动路径。

3.2.1 战略驱动+品牌转型

“战略驱动+品牌转型”模式(以下简称“模式 I”)常见于国家或区域级科研院所图书馆。模式 I 时间跨度最长,将国家战略贯彻落实为组织战略,并以组织战略驱动组织行为。该模式的本质是医学图书馆整体转型拓展出智库职能,能够独立进行完整的智库活动,或承担智库研究活动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服务用户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医学研究机构、企业、园区等。

模式 I 中的医学图书馆有从事医学信息服务与医学情报研究的深厚基础,原有业务内容涉及医学卫生情报保障、医学信息标准制定、医学数据治理与共享规则研究、医学情报分析工具开发等,寻求从医学信息情报机构向医学

科技智库的转型。转型的内在潜力在于,医学情报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具备较强的实践应用性,不仅可以解释微观视角的单个科学研究问题,还能够用于揭示医学科技领域的诸多宏观问题。例如,医学专利分析方法(专利组合与专利池分析)能够揭示技术发展态势与竞争格局;医学科技评价体系既包括对国家、区域、机构的医学科技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也包括对医学科技人才(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青年人才等)独特的“破五唯”价值评价方法。

医学科技智库是品牌转型的核心目标和主线方向。国家或区域级医学图书馆的地位决定了其能够直接或通过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对话政府决策层,对接医学科技领域决策咨询需求。医学科技产业行业的特殊性使医学科技信息资源具备更多样的应用场景,医学图书馆能够同时向企业、园区提供商业服务。现有服务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模式 I 中的服务用户及具体内容

用 户	具体内容
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医学科技政策、医学科技体制改革、医学科技战略、医学科技创新战略、医学学科发展战略、医学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医学前沿技术跟踪、医学技术预见等
研究机构	科学研究态势与竞争策略、对标机构竞争情报分析、科学家学术表现评价等
企业或园区	医学科技产业发展策略、企业研发与管理策略、政策情报分析、竞争情报分析(含医疗器械、药物创新研发等)等

3.2.2 机构重组+精准循证

“机构重组+精准循证”模式(以下简称“模式II”)常见于综合性院校的医学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模式II的本质是,医学图书馆承担智库的核心功能,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在很多研究和文献中也表达为智库型服务)。与模式I的显著不同在于,用户大部分是其所在母体单位的各级管理决策层(如校领导、院领导、院系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等)、业务部门(科研团队、临床团队等)和行政职能部门(人事管理部门、科研管理部门等),仅有少数能够直接触及所在区域的政府决策层。

模式II中的医学图书馆有开展文献检索、参

考咨询、情报研究服务的能力和组织基础。由于智库型服务具有阶段性和流动性,为保障与原有服务的多线程并行以及工作量的合理分配,医学图书馆建立智库项目组,在开展决策咨询服务时,从原有情报研究部、学科服务部、参考咨询部等部门灵活抽调馆员加入智库项目组,形成了矩阵式的人员架构模式(见图1)。依据任务性质和侧重点,每个项目组人员规模、比例可灵活调整。有些医学图书馆的智库项目组经不断发展成为独立业务单元或部门。现有常见服务内容如表3所示,均贯彻循证原则,为某一具体决策问题的解决提供高质量的精准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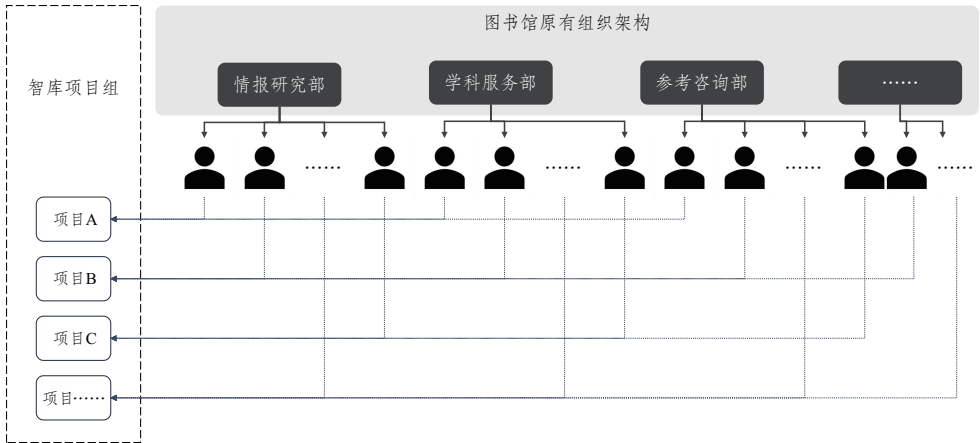


图1 矩阵式人员架构

表3 模式II中的服务用户、方向及具体内容

用 户	方 向	具体内容
机构管理高层 (机构决策者)	面向双一流或国际一流的 医学学科建设和教育发展	整体资源分配方案及绩效评价,学科建设与布局规划, 同类对标机构的对比分析等
决策管理中层 (院系、科室等)	部门建设与发展	学科发展跟踪,学科研究态势及竞争格局分析,人员绩 效,发展规划,同类对标机构的对比分析,完成上级任务
业务部门	基础研究	研究热点,关键科学问题发现
	临床研究	合作对象发现,临床证据总结,循证服务
	技术转化	专利知识库建设,专利态势、竞争格局及潜在风险分析, 高价值专利发现,专利布局,专利导航
职能部门	人才评估与人才引进	运用文献计量和替代计量学方法,开发临床、科研等不同 人员的多维度分类评价标准,开展科研人才发现与评价
	科研规划	为机构未来的科研发展方向提供策略规划

3.2.3 协同创新+业务拓展

“协同创新+业务拓展”模式(以下简称“模式Ⅲ”)常见于医学院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模式Ⅲ是在近几年“大健康”背景下新兴的参与模式。在此模式中,医学学科带头人或医学研究机构等直接承接了决策层下达的智库建设任务,医学图书馆间接却全方位、全流程地参与了智库建设,作用环节既包括智库研究活动,又延伸至智库搭建、开发、运营环节。与模式Ⅰ、Ⅱ的显著差异在于,医学图书馆主要以项目合作者身份出现,嵌入智库建设这一场景下,与医学学科带头人、医学研究机构实现资源要素、组织要素、能力要素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共同搭建一个具体的智库机构,更加超出传统图书馆业务的框架,最终知识成果既包含研究报告、规划方案等文字产品和信息资源平台,又拓展到人才培养、工具开发、健康科普、空间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

决策支持仍是模式Ⅲ的核心功能,医学图书馆作为独立图书馆具备完整的服务体系和功能。在智库建设中的任务是调动全馆力量协助合作方完成决策层下达的决策咨询任务,并对合作方的决策全流程提供咨询建议。此外还承担了一系列智库延伸功能的搭建,协助构建中国特色智库的生态圈。第一是人才培养,医学

院校、医院和智库都承担着医学人才教育的使命。医学人员需承担科研和临床的双重任务,有终身学习的需要,医学图书馆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人才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医学图书馆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导医学人才胜任标准的开发,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考核指标。第二是工具开发,医学图书馆既为共识、指南等产品开发提供方法学支持,又在数字化工具开发中担任产品经理的角色,将医学用户需求与技术团队的认知有机连接。数字化工具包括专病知识库与知识图谱、个性化推荐系统、临床辅助决策数字工具、医疗智能问答机器人等。第三是健康科普,通过面向公众的知识普及,协助智库扩大公众影响力,提升公众的健康信息素养。第四是空间服务,为智库机构开辟专属空间,赋予智库成员较高的使用权限。

3.3 发展过程

随着时间推移,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行动先后经历了深入、迭代和升级阶段。基于访谈数据及相关文献和案例的总结,本研究归纳出上述三种行动路径纵向发展的历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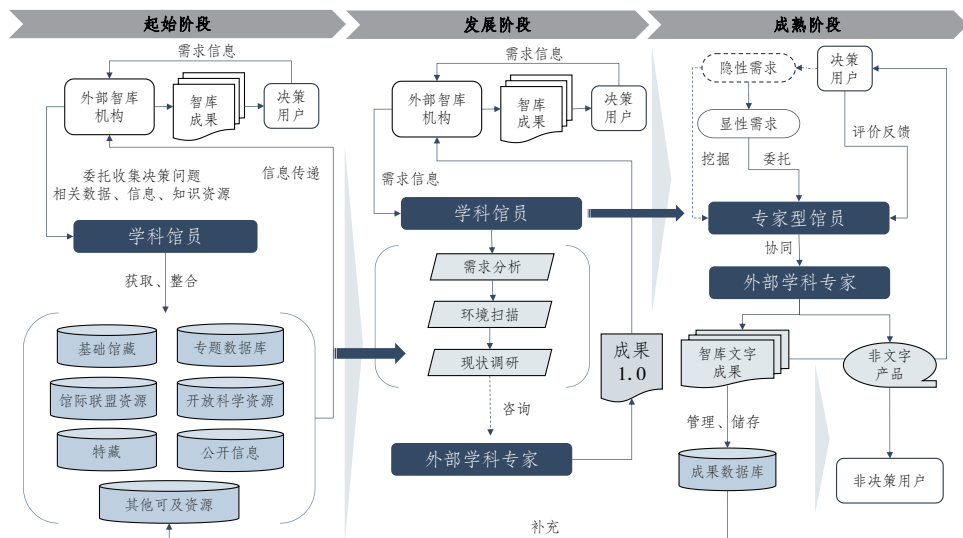


图2 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路径

在起始阶段,医学图书馆学科馆员通过传统信息资源保障服务参与智库建设的前端环节,此时医学图书馆无法接触决策层,由外部智库机构分解决策需求后直接提出数据信息资源需求。在发展阶段,医学图书馆除提供数据和信息保障外,开始参与智库报告的撰写工作,能够承担的任务因各馆情况不同而异。为保障报告的精准性、专业性,通常会咨询外部学科专家获取建议。在成熟阶段,医学图书馆培养或引

进了专家型馆员,且能够对话决策层直接获取决策需求。同时,医学图书馆也应用图情学科的用户研究方法开展服务工作,不仅满足用户的显性需求,还能够提早捕捉决策用户的潜在需求,引导其产出新的决策产品。部分图书馆关注到中国特色智库同时惠及非决策用户的功能,以非文本、多样化的智库服务分支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三种模式在各阶段发挥的功能如表4所示。

表4 三种模式在各阶段的功能

	起始阶段:在智库活动起点 发挥信息资源保障作用	发展阶段:在智库活动前端 发挥情报支撑作用	成熟阶段:参与智库建设 全过程中的核心活动
模式Ⅰ	医学科技文献保障	医学情报	科技智库
模式Ⅱ	参考咨询	决策咨询	决策咨询主题拓展
模式Ⅲ	学科服务	智库报告撰写	智库架构搭建

通过梳理访谈结果,笔者将促使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阶段演变的动力划分为环境驱动、用户驱动、内部驱动三个方面。

环境驱动是指外部环境制度对医学图书馆造成的压力,在对外部环境作用分析过程中,本

研究借鉴组织制度理论的研究成果^[44],将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环境驱动因素归纳为强制压力(coercive pressure)、模仿压力(mimetic pressure)和规范压力(normative pressure),情境化解读如表5所示。

表5 外部压力类型及内涵

类 型	内 涵
强制压力	医学图书馆所依赖的组织向其施加的约束和正式压力。
模仿压力	医学图书馆在涉足新业务领域时,通过模仿行业标杆组织和借鉴行业流行的经验,设计自身行动路径,逐步稳定行为并得到普遍认同,从而获取并保持竞争力。
规范压力	医学图书馆所处社会环境的文化偏好和期待,行业内部形成的规范等。

强制压力是医学图书馆所依赖的组织向其施加的约束和正式压力,具体指上级部门或更高决策管理部门对医学图书馆的功能升级的硬性要求。这些要求往往是需求导向、任务导向、问题导向的,即便不以政策、文件、规章、标准的形式出现,也对医学图书馆的决策和行动起到了强制性作用。强制压力对国家级医学专业图书馆的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受访者A9提到:

“决策层要求我们回答一系列场景化、立体多维的问题,我们已有的人员、技术、资源储备

以及擅长的对文献外部特征的计量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图情的圈子,跟具体领域的研究专家进行知识体系的互补匹配,深入到内容层面。”

模仿压力来自不确定性,具体指医学图书馆在谋求自身转型发展过程中,触及参与新型智库建设这一创新业务领域时,通过模仿行业标杆组织和咨询行业广为流传的经验行为,使自身地位趋于稳定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从而获取并保持图书馆的竞争力。国家级医学专业图书馆长期

跟踪国际主流医学图书馆界的先进做法,研究国际主流智库的性质和特征,匹配自身定位与使命,尝试制定国家规范,发挥标杆引领作用;其他医学图书馆重点关注同类机构的经验与做法,力求紧跟学科发展进程。例如,受访者 A8 提到:

“刚开始我也不太确定医学图书馆在新型智库建设中可以做些什么,哪些更容易出效果,后来在业界会议中跟同仁交流时,知道了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就会想其实我们馆内也具备做这些的基础和条件,随后我就会在馆里带头进行一些实践尝试,保证我们(医学图书馆)不掉队。”

规范压力则源于行业和社会环境对医学图书馆业务范围、新型智库建设行动及二者关系的固有认知与传统理解。具体表现为,当前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行业内对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合理性与价值性莫衷一是,社会认知中新型智库建设与医学图书馆也很难被联系和匹配起来,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缺乏行业规范和社会环境的认同和期待,甚至表现为不理解、不认同。规范压力对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行动可能是正向促进的,也可能起到约束作用。例如有受访者提到:

“这几年图书馆界对智库的讨论很多,我们也会思考作为医学专业图书馆,可以做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A17)

“也有人认为‘智库’是更高层的事情,不是医学图书馆应该关心的,也不是医学图书馆能做到的。”(A2)

“刚开始我们提出参与智库建设规划时,会遭到质疑,甚至同事也会‘持保留意见’,确实会对工作的热情和自信造成负面影响。但我们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之后,会得到用户和同行肯定。我认为打破传统意义上对医学图书馆的认知框架,是我们选择参与智库建设的动力,也希望能够在扭转刻板印象、促进行业发展上有些许价值。”(A8)

用户驱动涉及传统用户需求驱动、传统用户需求升级驱动、拓展用户驱动三个阶段。医

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起点是传统参考咨询服务,以此获得了与传统用户之间的联系。传统用户因智库相关需求向医学图书馆寻求服务时,最初仅需要单纯的数据提供和展示,后升级到用工具揭示数据,进而要求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逐步由医学信息资源的外部特征升级为内部特征,从经验型劳动服务转变为创新型知识服务,从前端边缘逐步走向核心,再参与到战略决策建议和顶层设计过程中。传统用户能够通过两种方式带来拓展用户,一是传统用户在需求满足、认可图书馆的价值后,会为有类似需求的用户推荐图书馆相关服务;二是传统用户在向决策层汇报的场景下,使用、展示医学图书馆生产的智库产品,会引起在场其他潜在用户和决策层的注意,从而为医学图书馆智库活动带来更多的用户。例如,有受访者提到:

“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来联系我,希望我们图书馆在学科规划上提供一些咨询服务。我询问之后才知道是护理学院院长推荐的。”(A1)

“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很容易被忽略的宣传渠道,那就是用户使用医学图书馆产品中的结果或结论作汇报展示的过程。”(A4)

受制度和渠道等条件约束,内部驱动在起始阶段无法决定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行动路径。然而随着图书馆在智库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正向反馈,通过“有所为”争取到了“有其位”,极大地激发了医学图书馆馆员的职业价值感和身份认同感,自主创新驱动力在多次参与智库建设的行动中不断增强。

4 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挑战

动机—机会—能力(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MOA)理论旨在解释驱动个体或组织从事特定行为的因素^[45,46]。动机是表达个体或组织从事某一行动的意愿、倾向和驱动力;机会通常指在客观环境中,个人或组织主体所感知且能够激发其特定行为的有效部分;能力是指完

成一个行动所需的知识、技能或经验,反映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内在可能性^[47]。本文根据 MOA 理论,提出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确保满足三个关键必要条件:第一,图书馆及图书馆员有足够的动机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第二,医学图书馆有足够的可行机会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第三,医学图书馆拥有与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相匹配的能力。鉴于此,下面从动机、机会、能力三个层面分析医学图书馆在实际行动中遇到的挑战。

4.1 动机障碍:缺乏价值认知与认同

动机障碍主要因为医学图书馆内部人员的驱动力不足。从内在驱动力来看,医学图书馆人员队伍整体结构上体现了医学与图情的交叉与互补,但就个体而言,大多数图书馆员仍然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和惯有业务的局限性。一部分医学馆员由于缺乏医学专业的背景知识,对解决医学问题的方法论缺乏了解,因此缺乏对医学智库的基本认识和理解。部分具备医学背景的馆员缺乏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对图情研究和实践前沿的关注不足,甚至对智库闻所未闻;即便具备对智库的基本了解,馆员也难以认识到医学图书馆与新型智库互相需要的关系和双轮驱动、合作共赢的潜力。一方面没有认识到或不认可医学图书馆对新型智库建设的价值,陷入自我怀疑,认为自身所做的图书馆工作与医学智库毫无关系、也难以上升到智库高度,导致难以激发对从事智库研究和智库实践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挑战欲,不愿成为参与医学智库建设的拓荒者和主力军。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意识到参与新型智库建设对医学图书馆的价值,缺乏对图书馆行业整体命运、医学图书馆发展关键及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敏感度。而从外源驱动力来看,参与智库建设是图书馆常规工作之外的内容,难以从图书馆组织层面与职务晋升和待遇挂钩,细致、量化的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设置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很难保证。

4.2 机会约束:起步困难与渠道限制

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机会约束主要因为图书馆在智库建设中的定位不清。当前国内医学领域智库建设热度远逊于社科类智库,且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两极分化严重,这决定了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机会总量先天处于劣势。而把握医学智库建设方向又身为智库服务用户的决策层、领导层,对于医学图书馆在智库建设中的价值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导致相关配套条件支持(保障、认定、激励)不足。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缺失约束了医学图书馆主动活动的空间。对于处在参与智库建设起步阶段的医学图书馆而言,一来难以找到参与智库建设的开局契机,在体制内的活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无法论证自身价值;二来原有人员、预算等配套设施的规模和结构仅能维系图书馆的基本运营,无法支持扩展智库业务。粮草未备,兵马难行。在此闭环困局下,许多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行动难以启动。而在已开展行动的医学图书馆中,大多数打破僵局的契机是由于同一单位第三方机构的引入,或所在母体单位管理层为响应更高决策层需求而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形成了“决策层—中间机构—图书馆”或“决策层—母体单位—图书馆”的“三明治”式结构运行模式。这种情况下,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具备或然性和被动性,中间部门隔断了医学图书馆与决策层直接对话的渠道。

4.3 能力瓶颈:数据、人才和技术的不足

医学图书馆具备的数据、人才与技术基础,常被视为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优势。但多维的决策场景、复杂的治理环境、问题导向的决策任务、瞬息万变的决策形势,对医学图书馆上述三个维度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学图书馆要在新环境、新形势、新情景下提升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能力,实现从基本满足到能力胜任的跨越,面临着数据、人才、技术上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背景对智库产品的生产与再生

产速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医学数据的特性加剧了数据服务决策的难度与风险。一是医学数据密集,规模大、结构复杂、迭代快,储存建设困难。二是关键医学数据国有化,临床数据孤岛化,隐私性高,获取困难。三是医学数据价值密度低、纬度高,数据处理与利用困难。同时,医学数据关乎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在国际形势影响下,医学智库产品的原始数据与研究结果开放程度收紧,保密程度提高。

现有医学馆员规模和配置难以满足智库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馆员队伍对图书馆传统业务(情报前端功能)得心应手,但缺乏转数成智、转智成治的知识储备与经验,产出成果描述性强而解释力不足,难以思考和回答现实环境中的问题。图书馆员的岗位设置对适合“旋转门”机制的智库人才缺乏吸引力,亟须补充具备领导视野、战略高度和系统化思维的智库型人才。

医学图书馆掌握的技术与方法足以应对常规医学情报任务,但现成的技术在解决医学现实问题中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医学情报技术能力面临挑战,一是理论技术转化落地的道路漫长,当前文献计量仍停留在外部特征描述上,能够深入内容层面的知识组织技术,如语义关联、知识图谱等在医学研究、临床实践中的效用尚未可知;二是技术革新的动力不足,技术革新的源动力仍是人才,医学情报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特征突出,门槛较高,而最有望推动技术革新、胜任复杂智库任务的技术人才恰恰也是最易从图书馆流失的高端人才。

5 医学图书馆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对策建议

5.1 紧抓健康中国重大战略部署与数智化全媒体时代的外部机遇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医学图书馆应主动对接国家需求,规避政策和制度障碍,开阔思路,广泛寻求争取智库研究课题、智库基地

建设等项目的参与机会,强化现有弱连接关系、盘活人脉资源、寻找机会与内脑(政府内设政策研究机构或部门,如各级各类研究室)合作,以获得起始阶段的资源投入。同时,医学院校图书馆、医学专业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各司其职,以自身资源、人才、技术、用户、渠道等为基础,探索与优势医学专科结合的“小而美”的专精参与方式,实现错位发展;与业界广泛开展协作、联盟、竞合,探索区域性、专题性的合作方式,实现“大而全”的资源共建、成本共担、成果共享、优势互补新格局。协作可以发生在跨区域医学图书馆之间,例如国家级、区域级医学专业图书馆定位不同,可以共建错落有致、分级覆盖的医学智库体系;也可以是不同类型医学图书馆的联动,例如医学院校图书馆与医院图书馆可以实现科学研究资源和临床资源的优势互补,尤其是基于现有的图书馆联盟,实现医学院校图书馆与其附属医院图书馆的合作。

在全面数智化的浪潮下,医学图书馆作为医学数据治理、知识组织的倡导者和构建者,应积极促进医学资源开放、治理和综合运用,将其作为长期保存和利用的战略资源,实现医学数据价值最大化。数智化转型也促进了开放科学实践的步伐,得益于国际医学开放科学数据平台的建设,医学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相关智库拥有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撑。同时,医学图书馆也应关注信息泄露风险,将智库成果密级标准研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媒体时代为医学图书馆助力智库凝聚主流价值观、引导公众舆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提供了有力抓手,医学图书馆应利用学科优势开展健康科普研究和科普实践活动,将专业产品科普化为公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提升医学图书馆的社会服务价值。

5.2 深挖医学图书馆跨学科、精专科的独特优势

5.2.1 促进多学科、多层次的队伍建设、深度协同与有效流转

医学图书馆的决策层在参与新型智库建设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对外联络

者,医学图书馆馆长是打开局面的先锋和中坚力量,需深刻理解图书馆事业,深刻理解医学学科特征,树立战略意识、提高敏感度,善于找到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发力点,提升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感知价值。作为对内组织者,馆长对所在图书馆情况熟稔于心,是创新变革的倡导者与引领者,需做好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内部监督,带动内部馆员素质提升,创造团结互助的合作氛围。

医学学科馆员是参与智库建设的任务承担者和主要力量,要提高学科馆员的积极性、价值认同、创造性和参与度。一要找准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带动整体前进,鼓励兼具医学和图情特长的馆员发挥领头羊作用,或引进人才激发“鲑鱼效应”。二要创造畅所欲言、头脑风暴的工作氛围,激发馆员面对职业生涯的内驱力和主观能动性,鼓励馆员挖掘兴趣和专长所在,并为其提供合适的机会,实现人员的合理配置。三要针对参与智库建设的馆员开展专项素养培育,如政治敏感度、学科敏感度、见微知著的能力、对外沟通合作能力、共赢意识、全局意识与长期视野、宏观站位与战略意识等。四要做好组织制度设计,采取矩阵式或项目组的形式,并允许学科馆员通过“旋转门”成为智库研究人员,深度参与智库研究活动,培养智库研究能力。

学科专家是医学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外部坚实保障。医学图书馆建立灵活的外部专家长期聘用或项目聘用制度,组建与图书馆密切联系的智库专家队伍、高端人才队伍,弥补内部队伍在整体能力与医学专业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和不足。同时,要充分发挥附属医院或所在院校的优势,通过提供高质量服务,与医学学术带头人以及未来领军人物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智库建设做好专家人才储备。

5.2.2 重视医学细分领域异质性核心资源建设,主攻医学情报技术落地的痛点和难点

资源是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基石。在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合所有可及资源,通过资源共建共享实现成本

控制。要引进培育异质性资源,例如围绕王牌医学专业、科室进行资源建设,挖掘核心优势,提升竞争力。要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在价值,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挖掘中医药古籍特藏价值。要强调医学数据的治理和利用,破除数据孤岛化,将母体单位下属院系、附属医院等产生的多样医学相关数据(病案数据、患者行为、基础医学研究过程数据、临床研究过程数据、医学图书馆用户数据等),作为战略资源进行长期保存与管护。要争取对接内脑,合法合规地获取并利用保密程度高的关键数据。

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涉及的主要技术是医学情报技术。宏观层面上,在大数据时代,情报思维要向工程化、系统化转变^[48],特别是大健康观念下的医学卫生事业发展,更需要多维、多源、多领域的情报支撑,医学情报技术发展和革新仍需要持续的攻坚克难。在微观层面上,医学图书馆在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应善用现有技术,对碎片化的文献数据进行知识重组和知识关联,构建医学知识图谱,充分挖掘文献的价值。同时,医学学科应用要求不厌其细、不厌其精,这就需要防范医学情报技术的泛化和虚化,任何技术投入临床应用前都要进行充分的设计和验证。因此,相关部门要集中力量主攻技术落地的痛点和难点,提高情报技术在医学科学领域的转化率。

5.3 开展嵌入式全周期医学信息实践,拓展行动的广度、深度和长度

图书馆的价值取决于能够为用户提供何种服务^[49],而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服务提供,如果希望这种服务对图书馆和用户双方都实现价值最大化,就要深入思考如何嵌入式地参与到用户服务的各项工作中。

拓展广度是指医学图书馆打破思维定式,通过环境扫描,在全周期、全过程的管理、医疗、教学、科研服务链条上,寻找行动切入的可能性,开辟创新业务。例如,嵌入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科研过程的数据管护、知识咨询和知识管理服务;主导临床指南、专家共识、数字化工具等改善临床实践的决策类产品开发;围绕转化医学提供转化地带发现、科研合作平台搭建、生物信息学方法支持等;加强医学图书馆的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医学产品进入市场的风险规避和竞争策略等。上述服务方向均是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潜在发力点,医学图书馆应树立资源观思维和市场竞争意识,综合自身条件选择发力点。

医学图书馆参与新型智库建设是对已有业务的升级,拓展了学科服务的深度和广度,虽然短期效益不明显、回报周期长,但长期收益率最大,能够持续滋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重大项目和变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医学图书馆应具备孵化意识,加强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主动

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并提供嵌入式服务,提高用户黏性,洞察用户深层次的复杂需求。管理决策层不仅需要专业深入的服务来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精准识别所面临的困境和痛点问题。随着行动战线的拉长、双向互动的加深,用户对医学图书馆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提升,在承接重大任务时,根据最省力原则自然会向医学图书馆寻求服务或协作,这也为医学图书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拓展机会。随着这类业务机会在个性化程度和挑战性上的递增,用户与医学图书馆的关系会从服务供需双方转变为价值共生双方,能够激发医学图书馆的服务潜力,催生医学图书馆的价值共创能力,有利于营造圈子内部的口碑,也能够激发聚集效应,吸引更多高层次用户。

致谢:本文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22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面向重大突发疫情的智库协同决策机制及典型案例研究”(项目编号:2269210930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放数据的价值共创机制及实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7207411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申静,蔡文君,毕煜. 智库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前沿[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12):33-41. (SHEN J, CAI W J, BI Y. The status, hot-spots and frontiers in think tank research[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0, 43(12): 33-41.)
- [2] 黄晓斌,彭佳芳. 国外著名智库的信息资源建设策略及启示[J]. 图书馆杂志,2022,41(7):80-87. (HUANG X B, PENG J F. Analysis of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selected foreign think tank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think tanks[J]. Library Journal, 2022, 41(7): 80-87.)
- [3] DUIGNAN P. The Library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part I. origin and growth[J]. Library History, 2001, 17(1): 3-20.
- [4] Library of Congress. About CRS[EB/OL]. (2022-07-02)[2022-08-21]. <https://www.loc.gov/ocrinfo/about/>.
- [5] LESLIE D. Industry experts gather to map future of libraries[J]. The Electronic Library, 1999, 17(3): 149-153.
- [6] JAEGER P T, BERTOT J C, GORHAM U. Wake up the nation: public libraries, policy making, and political discourse[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3, 83(1): 61-72.
- [7] YANAGISAWA T. The contributions of public library activities to policy-making by civic collabor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3(69): 83-102.
- [8] 张燕蕾. 智库:图书馆发展的新机遇[J]. 图书馆学研究, 2009(11): 5-7. (ZHANG Y L. Think tank: the new localization of library[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09(11): 5-7.)

- [9] 黄如花,李白杨,饶雪瑜. 面向新型智库建设的知识服务:图书情报机构的新机遇[J]. 图书馆,2015(5):6-9. (HUANG R H, LI B Y, RAO X Y. Knowledge service oriented new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 new opportunit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J]. Library, 2015(5):6-9.)
- [10] 初景利,唐果媛. 图书馆与智库[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46-53. (CHU J L, TANG G Y. The libraries and think tank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8, 62(1):46-53.)
- [11] 吴育良. 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分析及启示[J]. 情报杂志,2015,34(2):188-193. (WU Y L.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of foreign think tank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5, 34(2):188-193.)
- [12] 陆雪梅. 高校图书馆服务新型智库建设的思考[J]. 图书馆学研究,2016(8):79-82,88. (LU X M.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to new think tank construction[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6(8):79-82, 88.)
- [13] 张艳菊. 基于智库理念的图书馆转型创新发展研究[J]. 图书馆学刊,2016,38(3):14-17. (ZHANG Y J. Research on library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hink tank[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2016, 38(3):14-17.)
- [14] 杨友清,陈雅. 基于智库理念的图书馆咨询服务模式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12,31(10):44-46. (YANG Y Q, CHEN Y.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reference servi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ink-tank[J]. Library Journal, 2012, 31(10):44-46.)
- [15] 吕长红,陈伟炯,梁伟波,等. 高校图书馆信息智库构建研究——以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为例[J]. 新世纪图书馆,2014(2):39-42. (LV C H, CHEN W J, LIANG W B, et al. Information think-tank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with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J]. New Century Library, 2014(2):39-42.)
- [16] 王凤满. 我国高校图书馆智库型服务体系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23):45-50. (WANG F M. Research on think tank service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 59(23):45-50.)
- [17] 张旭. 高校图书馆智库型服务体系构建及能力评价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2019. (ZHANG X. Research 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apability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think-tank service[D]. Jilin: Jilin University, 2019.)
- [18] 陈建龙,邵燕,张慧丽,等.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的前沿课题和时代命题——《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解读[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8(1):17-28. (CHEN J L, SHAO Y, ZHANG H L, et al. The frontier issues and contemporary propositions of academic library moderniz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ss of Academic Library Modernization (CALM) Report*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2, 48(1):17-28.)
- [19] 魏东原,王春明. 区域科技图书馆科技智库建设探索[J]. 图书馆论坛,2016,36(12):70-75. (WEI D Y, WANG C M.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J]. Library Tribune, 2016, 36(12):70-75.)
- [20] OLIVER K, INNVAR S, LORENC T,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arriers to and facilitators of the use of evidence by policymakers[J].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4, 14(1):1-12.
- [21] DIAS R I, BARRETO J O, VANNI T, et al. Encouraging the us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n decision making[J]. Cadernos Saúde Coletiva, 2015, 23:316-322.
- [22] HUMPHREYS B L. Meeting information needs in health policy and public health: priorities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and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Libraries of Medicine[J].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1998, 75(4):878-883.
- [23] CLEVELAND A D, HOLMES K L, PHILBRICK J L. “Genomics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an innovative course to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ibrarians[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2012, 100(4):303-305.

- [24] BARDYN T P. Health sciences libraries advancing collaborative clinical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J/OL]. Journal of Esience Librarianship, 2018, 7(2) [2023-02-2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197832/>.
- [25] WAGNER K C, BYRD G D.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medical librarian program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2004, 92(1): 14-33.
- [26] MARSHALL J G. The impact of the hospital library on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the Rochester study[J].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992, 80(2): 169-178.
- [27] 程晓岚. 协同服务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智库建设路径探析[J]. 情报科学, 2020, 38(3): 107-112, 136. (CHENG X L.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university library think t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service[J].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 38(3): 107-112, 136.)
- [28] 耿波, 刘宁, 陈静, 等. 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7, 26(3): 46-49. (GENG B, LIU N, CHEN J, et al. Translational medicine-based reference service in academic library[J].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7, 26(3): 46-49.)
- [29] 杨颖, 许丹, 郭继军. “双一流”背景下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8(12): 62-66. (YANG Y, XU D, GUO J J. The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paradigm innovation of medical libr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J].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18(12): 62-66.)
- [30] 曹玲静, 陈云伟. 国际研究型图书馆战略规划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8): 146-152. (CAO L J, CHEN Y W. Strategic pla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ibra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0, 64(18): 146-152.)
- [31] 田杰, 姚海燕, 罗志宏. 医院图书馆转型及其信息情报研究中心服务[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22, 43(3): 84-87. (TIAN J, YAO H Y, LUO Z H. The transforming of hospital library and its infor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 service[J].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22, 43(3): 84-87.)
- [32] 董丽. 2018年我国内地医学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进展分析[J]. 晋图学刊, 2020(3): 75-79. (DONG L. Research progress of service mode of domestic medical library in 2018[J]. Shanxi Library Journal, 2020(3): 75-79.)
- [33] 胡姗姗, 俞凯君, 龚瑞怡, 等. 新型智库建设视域下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服务功能探讨[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9(2): 95-100, 120. (HU S S, YU K J, GONG R Y, et al. Probe into service function of think tanks in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view of new think-tank construction[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9(2): 95-100, 120.)
- [34] 汪芳. 浅析医学高校图书馆构建智库的思考[J]. 科技视界, 2017(5): 267-268. (WANG F.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 by medical college libraries[J]. Science & Technology Vision, 2017(5): 267-268.)
- [35] 刘玉婷, 黄芳. 医学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9, 40(9): 7-11. (LIU Y T, HUANG 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future trend of reference service of medical libraries[J].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19, 40(9): 7-11.)
- [36] 黄芳, 王晓民. 面向智库建设的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8, 27(1): 58-61. (HUANG F, WANG X M. Think tank development-oriented subject service in academic medical libraries[J].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8, 27(1): 58-61.)
- [37] 王伟苗. 健康智库建设的价值、现状与路径[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 4(1): 51-56, 65. (WANG W M. Value, status and path of health think tank construction[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19, 4(1): 51-56, 65.)
- [38] 王悦, 李静. 中国健康智库建设的价值探析[J]. 医学与哲学, 2017, 38(2): 60-62. (WANG Y, LI J. Dis-

- 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health think-tank construction[J]. *Medicine & Philosophy*, 2017, 38(2): 60-62.)
- [39] 应峻, 王丁一, 王钰琛, 等. 面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智库机构用户信息需求分析——以传染病领域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4): 14-22. (YING J, WANG D Y, WANG Y C, et al.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users' information needs of think tank facing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aking the fiel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s an exampl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2, 66(4): 14-22.)
- [40] 王辰. 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解决医卫领域“卡脖子”问题[EB/OL]. (2021-08-04) [2022-07-20]. <http://www.rmzxb.com.cn/c/2021-08-04/2922229.shtml>. (WANG C. Concentrate on tackling key and core technologies, accelerate efforts to solve the containment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ector [EB/OL]. (2021-08-04) [2022-07-20]. <http://www.rmzxb.com.cn/c/2021-08-04/2922229.shtml>.)
- [41] 袁曦临. 制约我国智库研究与发展的瓶颈问题——跨学科研究与专题性研究资源保障[J]. *情报资料工作*, 2017(5): 99-104. (YUAN X L. On the bottleneck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matic research resources support[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7(5): 99-104.)
- [42] 王雯, 谭婧, 任燕, 等. 重新认识真实世界数据研究: 更新与展望[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0, 20(11): 1241-1246. (WANG W, TAN J, REN Y, et al. Real-world data studies: update and future develop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20, 20(11): 1241-1246.)
- [4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2019[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34.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erms in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Chinese terms in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2019*[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34.)
- [44] 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147-160.
- [45] APPELBAUM E, BAILEY T, BERG P, et al. Manufacturing advantage: why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pay off[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6.
- [46] DAVIDSSON P. Continue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need, and opportunity as determinants of small firm growth[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1, 6(6): 405-429.
- [47] 陈则谦. MOA 模型的形成、发展与核心构念[J]. *图书馆学研究*, 2013(13): 53-57. (CHEN Z Q.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ore constructs of MOA[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3(13): 53-57.)
- [48]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 2017, 36(4): 331-337. (SU X N. The return of informatics and intelligence work in big data era[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7, 36(4): 331-337.)
- [49] 初景利, 赵艳. 图书馆从资源能力到服务能力的转型变革[J]. *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1): 11-17. (CHU J L, ZHAO Y. Library capacity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based to service-based model[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9, 63(1): 11-17.)

应峻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上海 200433。

王钰琛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上海 200433。

金淑霏 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赵宇翔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4。

(收稿日期: 2023-02-06; 修回日期: 2023-03-10)